司馬中原與鹿橋

述口原中馬司
錄筆雲月陳

鹿橋是我年紀輕時就仰慕的作家，而我們都姓吳（鹿橋本名吳訥孫，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），感覺上血緣好像又近了一點，但第一次見面却是幾經折騰。

鹿橋本行是專攻數學，寫作並不是他的主要成就，但一本「未央歌」不知風靡了多少中、大學生，他重視思想成就更甚於文學表現。在民國六十三年以前，我和他只有書信往來，六十三年冬，我到紐約作客，百忙中我抽出空閒，與高采烈的飛往聖路易華盛頓卅立大學去看他，一路上大雪紛飛，但我的心却是熱呼呼的。結果，抵鹿橋寓所，才知道他飛往紐約看我，兩人在空中失之交臂。

眞正的初逢是在民國六十六年，鹿橋夫婦回國，我們夫妻帶著孩子到國賓飯店去看他，兩人一見如故，深夜長談還嫌不够。雖然在文學表現上，我與現實生活較密切，鹿橋思想性較高，但這種差異並不影響咱二人的溝通。

我很佩服鹿橋的創作思想，他心靈的深度與廣度都很够，由於他耿介的性格，加上抗戰期間對中國苦難的承受及漂泊異國的孤寂感，使他對中國文化作一次重新審查與透視。有人會反問鹿橋：「抗戰生活顚沛流離而辛苦備至，爲什麼『未央歌』中描寫出來的大學生活，却是那麼唯美？」鹿橋的解釋是：「苦難就讓我們這些經過抗戰的人承受，美麗的一面應該留給下一代。」

鹿橋爲了更進一步詮釋他對這一代青年的期盼，曾託我向國內青年轉達下面的感受：

我高中畢業那一天，天高氣爽，校園內陽光普照，青草地上却有青、綠、枯三種層次的草皮，我當時就覺得納悶：同樣的陽光、土壤和雨水，何以其生長情形不同？因此，我用鞋子踢了踢枯草，才發現原來枯草底下的草皮已經翹起來，懸在半空中，各種滋潤對它都引不起效用，而年輕的知識份子，正是這些長在翹起來的草皮上的草，飄浮而不踏實。因此，畢業典禮過後，我和一個同學分別徵得父母同意，從東北出發，由北而南而西，走訪全國各地文物風光，在長途旅行中，我體會到許多不同的生活，也更深切認識我所生存的國家。

有一天，我們走到連雲港（隴海鐵路東端起點），看到這個中國人用自己智慧建造的港口，我面對東海晨曦，仆在地上而有熱淚盈眶之感。幾十年後，中國歷經這麼多流離戰亂，我回到臺灣看到我們的臺中港，感動的情緒更高：在這僅存的蕞爾小島上，堅忍的中國人在這裏推進中國文化，眞是文化精神的極致。

當年我們把『未央歌』當做最美的夢，今天臺灣的青年孩子們比我所遭遇的還要美，但他們却老是說苦，都因少流離啊！」

鹿橋認爲，每一代的人都要面對他們所生存的時代，去創作和生活，而「文學是無止境的，但求盡心而已」這一點，更是鹿橋和我的共同看法，也因此我們兩人見面機會並不多，心靈却能契合無二。

司馬中原與蘇雪林

蘇雪林是一位世家千金，女師專畢業以後，教了一陣子小學，就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，畢

業後又到法國攻讀文學和藝術，後來她放棄了巴黎近郊平靜的生活，回臺灣共赴國難，這種情操令我很感動。

我小時候就常聽人提起蘇雪林的大名，中學課本上更讀到她的文章，但一直未能一見廬山眞面目。後來，有一次我和余光中到成功大學演講，我們「高高在上」的坐在講台上，這時我看到聽衆席上有位中年婦女，我悄悄地告訴余光中：「那位女士很像是蘇雪林。」這是一種直覺。演講完後，輪到聽衆發問，蘇雪林第一個發問，隨後我們討論了許多問題，我的感想是，仰慕多年的前輩，第一次見面竟然是我在演講，她坐學生席，除了不好意思之外，更多「班門弄斧」之感，這次見面，蘇雪林的侃侃而談，精神奕奕，給我很深刻的印象。此後我每次到臺南，總要去看看她。她目前仍從事教職，照樣從事她對古典文學的研究與寫作，最近還獲得國家文藝獎，在諸多女作家中，算是相當執着的一位。

跟蘇雪林的初逢，讓我想起有一次我到臺南佳里去「指導」一個「寫作座談會」，會中赫然發現楊逵和吳濁流也來了，那次月光討論會中，我們所有與會者都相當盡興。可見文學沒有界限，不分年齡，優秀的文學家永遠不老，不堅硬古板，也不會老化，他的心態就像小孩子一樣的天眞。

蘇雪林的散文流暢有情，溫婉而不冗雜、不漂浮。早年她喜歡和人打筆仗，我覺得一個執著的人，具有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的性格，基本上「不讓鬚眉」的個性，主宰了她一生，但她爲她心中的眞理而爭，對與否，是與非則交予大衆傳播去評論，我們不要因此否定任何人。每個作家都代表他個人，重要的是從他的作品中去看，去體會他的精神世界。

蘇雪林成名極早，目前總有八十歲上下了，她身體狀況並不好，我倒覺得國家或文藝機構對於這些老作家們，應撥出一份心力來照料他們，否則，作家的晚景眞是太孤單了。

司馬中原與徐訏

在文學上，徐訏是個全能，小說、散文、劇本、詩和文藝批評，沒有一樣不行，林語堂曾推崇徐訏與魯迅二人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傑出作家，而西方漢學家如柏圖西奧里（Giuliano Bertuccioli）及非文藝界人士、學者們，也都欽佩徐氏的著作，並同意徐訏在廿世紀中國作家，是居於領導地位。但是，我和他却很晚才見到第一次面——我早年在北方，他在海外、巴黎；我在國內轉軍征戰，他在印度、新加坡旅行講學，好像有意互相躲藏。

來臺灣後，我在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做事，鈕先銘將軍是我的上司，他與徐訏是留法的同學，因此，當徐訏來臺走訪鈕將軍時，我第一次見到徐訏，由於有文學牽線，兩人非常投機。後來每次徐訏來臺，我就請他上各種風味的小館子，喝兩杯老酒，聊到盡興才分手。

徐訏是浙江人，生於一九〇八年，一九三一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，又留校讀了兩年心理系，五年後赴法留學，抗戰軍興而返國，曾任「人間世」半月刊編輯，在香港幾所大學教授中國文學，一九六九年起，在浸會學院任中文系主任兼新亞書院中文教授，一九八〇年十月五日辭世。

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他去世那年，世界筆會在巴黎召開一次「中國的抗戰文學」座談會，徐訏代表香港筆會出席，途經臺灣，我請他在「中興餐廳」吃飯，我說：「抗戰期間的作家都在臺灣、香港，世界筆會不請在臺的作家談，而邀大陸作家，這種會議怎麼會成功？」徐訏說：「去聽聽也好。」態度是那麼平和安詳。我說：「如果座談結果有偏頗之處，您返臺後，我們找一羣眞正在抗戰時期擔任文學工作者及作家，來談一談眞正的『中國的抗戰文學』。」徐訏滿口答應：「好！好！」想不到他開完會，還沒有來到臺灣，就病倒香港，很快辭世，眞令人傷慟。